

从关税改革看英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

欧阳萍

内容提要 工业革命的爆发和发展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也使自由放任原则成为英国政府在制订经济发展战略时的主导思想。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20世纪初英国政府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关税改革:大幅度提高外国商品的进口税,并且在帝国内部实行帝国特惠制,逐渐摒弃贸易自由主义而转向保护性关税政策。这场关税改革表明英国政府在制订经济发展战略时重心发生了转移,从自由放任原则逐渐向国家干预主义转变。改革不仅为此后英国经济复苏形成了重要的推动力,而且还为二战后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关税改革 自由贸易 谷物法 经济发展战略

众所周知,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19世纪时即成为世界工厂,与此相适应,英国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上长期推崇自由放任的原则,尤其表现为在对外贸易方面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然而,到19世纪70年代,在美、德等后起工业国家的激烈竞争下,英国经济出现了相对衰落趋势,其长期奉行的自由放任经济发展战略开始遭到冲击。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使英国遭受沉重打击,英国由债权国变为债务国,航运和国际贸易大为削弱。因此,20世纪初英国政府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关税改革:大幅度提高进口税,实行帝国特惠制,逐渐由自由贸易政策转向保护性关税政策。关税改革不仅有助于英国经济的复苏,更重要的是,标志着此时期英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逐渐由自由放任向国家干预转变,英国经济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最终过渡到二战后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和社会的阶段。

始于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使英国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英国成为了众所

瞩目的世界工厂,其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据统计,1860年英国人均生铁产量为132千克,而同期欧洲大陆的人均产量仅为10千克,其中法国和德国的人均产量略高,也仅分别达到26千克和13千克。至1860年,占世界人口2%和欧洲人口10%的英国几乎生产了世界工业产品的40%—50%,欧洲工业品的55%—60%^①。由此可见,到19世纪中期,英国经济的发展已在世界上居于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同时,英国又是最大的殖民帝国,其版图最大时占地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商品销往全世界,这就使英国有可能冲破国内经济保护主义的限制,在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时以自由放任理论作为基本原则。18世纪末,英国经济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古典经济学家在批评重商主义的基础上,创建了以自由放任为核心内容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他们认为各种经济活动都不应受到国家的任何干预,而应由市场按照价值规律去进行调节,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以及经济自由主义的深入人心,英国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逐渐摒弃传统的重商主义而向自由放任主张倾斜:大幅度降低国外商品的关税,取消了贸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货币、产业、资源——英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项目号:05BSS014)阶段性成果。

易特权公司,并着手废除谷物法和航海法等限制经济生产或限制资本和企业的保护主义法律。

在自由放任思想的支配下,英国政府在关税领域逐渐取消贸易保护主义,采取全面的自由贸易政策。1821年,英国对关税进行了初步调整:降低了针对波罗的海地区及其他欧洲国家木材的高额关税,并将从美国进口的木材的关税减少了一半。1823年,贸易大臣威廉·哈斯基森(William Huskisson)上任后对长期以来的航海法作出重大修订,对所有进入英国的货物,不论用何种船只运输,一律征收同等关税并实行税后退款。1825年,哈斯基森又取消了对外国生丝输入英国的禁令,对其征收25%—30%的关税,并且逐渐降低了大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棉纺制品、羊毛制品和亚麻制品的进口税从1819年的50%分别减至10%、15%和20%,而皮革制品和陶器则从75%的高额关税分别降至30%和15%^②。1842年以后,英国政府陆续削减所有工业原材料、工业制造品、木材的进口税,并取消了羊毛进口税和棉花进口税。在1841—1846年间,皮尔政府共取消了605种商品的进口税,降低了1035种商品的进口税^③。到1852年,英国“依旧征收关税的仅有一些重要原料,就是木材、铜、铅和锡”,而其时“这四种原料的关税都是微乎其微的。”^④

英国政府全面推行自由贸易、废除关税保护主义,最典型的例子是废除谷物法。英国最初颁布谷物法是为了限制谷物的输出,但到1815年时谷物法则完全成为保护性法律,严重损害了工商业者和广大农民的利益。1828年,在哈斯基森和威灵顿等人的推动下,政府对谷物法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不再将谷物价格固定化,而是采用浮动税率制(sliding scale),即国内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关税按一定比率提高,价格上涨时关税按一定比率降低。具体说来,当国内粮食售价为每夸脱52先令或更低时,所征关税为34先令8便士,当价格上涨达到73先令时则关税降为1先令^⑤。1841年罗伯特·皮尔再次担任首相后,又对谷物进口税进行了调整,较大幅度地降低关税。随着英国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歉收造成的饥荒,英国政府最终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谷物法的废除不仅给土地贵族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且“标志着英国全面放弃保护关税政策”^⑥。此后,政府进一步废除其他限制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的法令,正如时人所说,“英国既行将废除谷物法,也未始不可进而废除航海法”^⑦,政府最终于1849年宣布废除航海法^⑧。至此,英国终于彻底告别以保护关税和垄断贸易为特征的传统商业政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

为建立世界性的自由贸易网络,英国还与其他国家签订了自由通商条约。1860年,英国与法国签订了一项通商条约,旨在消除英法之间的关税壁垒:英国同意废除所有从法国进口的制成品的关税,削减法国酒类如白兰地、葡萄酒的进口税,并承诺不禁止煤炭的出口;而法国方面则保证降低英国出口的煤炭、焦炭、生铁、钢、机械、纱线及亚麻制品的关税,在1861年实现征收商品从价税30%,到1864年则不超过25%。实际上除了钢铁和其他少数商品之外,法国征收的平均税率基本上未超过15%^⑨。1860年英法通商条约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最惠国待遇的起源,也是19世纪60年代把欧洲大部分地区变成低关税集团的第一个贸易条约,为欧洲开启了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新时代。此后,英国又与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缔结商约,相互提供最惠国待遇,降低各国对英国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这一系列条约意味着英国自由贸易政策在国际上的胜利。通过上述措施,“到19世纪60年代,自由贸易——特指不实行保护关税——已经成为英国政治中正统观念的核心,几乎像新教国王取得了继承权一样拥有牢固的地位。”^⑩英国进入了一个自由放任经济发展战略占主导地位的时代。

二

进入19世纪后,英国经济持续增长,到19世纪中叶达到鼎盛时期,正如西方学术界所普遍认为的,1850—1873年是“伟大的维多利亚繁荣时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维多利亚中期的繁荣”^⑪。经济繁荣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就是英国政府推行的自由放任经济发展战略:自由贸易政策促进了英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煤炭、钢铁、造船等工业获得了更稳定的发展基础。然而,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令人不安的阴影:在维多利亚繁荣时期后接踵而至的是19世纪7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到20世纪初又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沉重打击,英国由债权国变为债务国,海外许多传统市场被美国、日本等国夺走,航运和国际贸易大为削弱。在经济困境中,长期以来英国实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形势,最终促使英国政府在几经踟蹰之后掀起了关税改革。

学术界常常把1870年看作英国经济史上的重要转折点^⑫,原因在于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英国逐渐陷入了经济相对衰落的困境。在农业方面,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国外农产品的大量涌入以及工业社会的发展对农业的冲击,进口农产品逐渐对英国农业形成了巨大冲击,英国农业开始进入长期的萧条时期。例如,进口小麦

在英国国内总消费量中的比例从 70 年代的 50% 逐渐上升到 90 年代的近 80%^⑬, 而英国国内的农产品价格则大幅度下跌。在工业方面, 英国各主要工业部门的年均增长率都有所下降, 仅以 1873 年到 1913 年的统计数字为例: 采矿业从 3.6% 下降到 1.9%, 制造业从 2.6% 下降到 2.0%, 建筑业从 3.1% 下降到 1.1%, 煤气和水电业从 5.5% 降到 5.1%, 运输业从 2.9% 降为 2.7%^⑭。同时, 由于美国、德国等国的激烈竞争, 英国在对外贸易方面也出现了不断萎缩的趋势, 1895—1907 年英国对欧洲市场的出口仅增长 44%, 同期德国增长 125%, 美国增长 500%; 英国对英帝国的出口增长 91%, 德国对英帝国则增长 129%, 美国为 359%^⑮。一战的爆发又使英国与其他几个西欧国家一样, “经济发展倒退了五至十年”^⑯。英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发生了急剧变化, 不得不向美国大举借债, 从债权国沦为债务国。由于失去了其绝对的工业优势, 深陷困境的英国逐渐开始修整关税, 开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关税改革。

关税是自由贸易的核心问题。作为 19 世纪最强大的工业国家, 这一时期的英国对绝大部分进口商品不予征税, 并基本上废除出口税。1873 年经济危机引发的大萧条威胁到许多大陆国家的农业发展, 促使这些国家纷纷对农产品采取关税保护政策, 并逐渐扩展到工业领域。这导致英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尤为不利的地位。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 英国经济学界就逐渐出现主张实行保护性关税的呼声。当时一些学者借鉴德国的理论和实践, 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关税改革的主张。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经济理论家威廉·阿什利 (William Ashley) 所著的《关税问题》一书, 对英国当前的贸易形势进行分析, 提出国家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干预经济, 实行保护性关税。文森特·凯拉德 (Vincent Caillard) 在《帝国财政改革》一书中也提出在变化的国际形势下英国应该通过关税为本国贸易提供保护^⑰。这些经济学家对英国的经济状况进行了专门研究, 以大量的数据说明实行关税改革的必要性。

1902 年, 为了缓解布尔战争所导致的财政紧张, 英国财政大臣决定对小麦和面粉等征收进口税。这虽然是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而出台的, 而且征收的税率也较低, 但这项政策表明在 20 世纪初英国已经出现了保护性关税的萌芽, 自由贸易作为一种实际的政策已经开始受到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为了将外汇用在最必需的战略物资进口上, 1915 年英国战时政府颁布了麦克纳关税法 (the McKenna Duties), 对汽车及其部件、钟表、乐器和其它奢侈品征收关税, 税额占商品总值的 1/3^⑱。

一战后, 英国进一步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优势地位。为改变这种状况, 劳合·乔治政府一方面试图恢复战前的经济政策, 放弃对私有企业的行政管制, 于 1919 年 9 月废除战时进口限制; 另一方面, 面对英国和世界贸易的不景气, 为了保护国内市场上本国产品的竞争力, 政府又开始部分接受保守党主张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除了继续实行战时的麦克纳关税法以外, 政府分别于 1919 年和 1921 年颁布了《重要工业关税法》(the Key Industries Duties) 和《保护工业法》(Safeguarding of Industries Act), 试图进一步扩大对商品的征税范围, 对由于外国竞争而受到打击的产业进行直接保护。《保护工业法》更是规定, 在五年内对战时工业发展所必需的产品, 如光学玻璃、光学仪器、科学用具、高级化工产品、真空管等征收 33.3% 的进口税。四年之后, 《保护工业法》又将征收进口税的商品范围扩展至餐具、陶器、花边、皮革、包装纸、珐琅镂空器皿等日常用品^⑲。尽管这些法令所涉及的进口商品并不多, 征税的规模也相当有限, 但这些法令的实施标志着英国在利用税收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方面,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欧美大多数国家的高关税政策, 尤其是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 逐渐使放弃自由贸易政策成为英国政界和商界人士的基本共识。1931 年 11 月, 英国议会通过一项为期六个月的《禁止不正当进口法》(Abnormal Importations (Customs Duties) Act), 其中规定贸易部有权对某些不正当进口如倾销商品征收高达 100% 的保护性关税。同年政府颁布《农产品法》(Horticultural Products (Emergency Duties) Act), 规定对新鲜水果、蔬菜和其他部分农产品征收最高可达 100% 的进口税, 帝国内部的农产品则不在征收之列^⑳。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 1932 年初, 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 (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 再次提出全面推行保护主义政策的建议。在内维尔·张伯伦的努力下, 是年英国议会通过《进口关税法》(Import Duties Act), 规定除小麦、肉类和英国不生产或短缺的原材料外, 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与此同时, 根据该法英国还成立了一个进口税建议委员会, 只要该委员会认为符合国家利益, 便可按提出申请的任何工业部门的要求对该工业进口商品征收不超过 33.5% 的关税^㉑。实际上, 到 1935 年, 该委员会建议征收的关税几乎已经涵盖了所有工业部门, 征税范围大大扩展。《进口关税法》生效后不久, 政府又将某些特定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至 15—33%。《进口关税法》的颁布意味着英国开始正式放弃长期以来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 转而走向全面保护的道路上。

在同年8月的渥太华会议上,英国与各自治领间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以帝国特惠制保护整个英帝国的市场。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英国对从各自治领进口的商品实行免税或减税的优惠政策;英国限制从帝国以外的国家输入农产品,以保证帝国各自治领农产品在英国的销售市场;英国工业品输往自治领时相应地享受关税优惠政策;对来自英帝国以外国家的商品则征收高额关税^②。自此,英国彻底地从自由贸易过渡到保护关税政策。

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政府在关税领域开展了影响深远的改革。从这场关税改革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政府在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时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从自由放任发展战略逐渐向国家保护主义战略倾斜。虽然出于对往日辉煌的工业成就和殖民帝国的恋恋不舍,英国在这一转变当中出现了许多斗争和反复,但迫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最终仍然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改弦更张。

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在英国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自由放任是基本的经济方针。”^③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在维多利亚统治时期的繁荣中发展到顶峰,因此,在当时的英国政府以及广大民众心目中,自由放任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正如格林指出的,在英国“一种普遍倾向是把自由贸易更多地视为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经济政策。”^④这种信仰在英国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大多数英国人认为英国要继续维持繁荣就必须依赖自由贸易的维持,无论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执政,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是以自由放任原则为指导。

然而,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欧美各工业国家的迅速发展和激烈竞争,英国在工业领域以及世界经济市场中的垄断地位逐渐被打破,经济发展呈现出相对衰落趋势。尤其是随着德国、美国和法国等后起工业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发展纷纷采取关税保护政策,继续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英国在农业、工业和国际贸易等方面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界和政治界人士都开始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关闭着自己市场的那些国家保持市场开放难道‘公平’吗?”^⑤政府开始考虑在关税方面进行调整。到1902年,英国的财政大臣为了弥补布尔战争的亏空,决定对小麦和面粉征收较低的进口税。这表明英国政府开始偏离正统的自由贸易政策,因此1902年预算案“很是应该被经济学家视为20世纪英国的起点”^⑥。翌年,约瑟夫·张伯伦组建了“关税改革同盟”,掀起声势浩大的关税改革运动,呼吁政府实行

关税保护政策和帝国特惠制度。这场运动引起了政界和学界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争,也导致了保守党的分裂,最终遭到失败。然而,即使如此,自由主义的绝对优势地位也受到了动摇,“成为风靡一时的一种哲学的自由放任主义,实际上纵非死亡,却也正向着比它理应受到的尊崇较有逊色的一个坟墓中走去。”^⑦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英国经济出现了相对衰落趋势,但直至1913年英国仍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国和最大的债权国,仍然拥有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和最广阔的殖民地,处于经济绝对增长的时期。然而,一战的爆发使英国的经济形势则进一步恶化。在战争期间,政府为了应付战时所需而颁布关税法,对汽车、钟表、乐器等一些奢侈品征收关税,对经济实行一定程度的管制。不过,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又试图回到原来的经济政策即自由放任经济发展战略中去。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争以及政府更替的事实说明,对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家干预经济是否必要,人们还心存疑虑,未形成共识。直到30年代的大危机沉重打击了英国经济,才彻底打碎了英国人恢复到战前状况的美梦,才使人们对于保护主义的干预经济战略有了新的认识。为了保护国内生产和市场,英国通过1932年《进口关税法》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建立了帝国关税特惠的关税保护政策。该法案的出台标志着英国放弃了长期以来的自由贸易原则,转而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英国进入了经济保护主义时期。

关税改革推动了英国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心转移,表明自此英国放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原则而采取经济保护主义政策。面对经济的不景气状况,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政府不断调整经济政策,开始对经济进行干预。除了提高关税、实行保护主义关税之外,政府还于1931年废除金本位制,利用纸币贬值来改善其商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为了加强贬值后的英镑的国际地位,英国还积极推动成立国际货币集团。除了在经济方面加以干预,英国政府还开始着手推行社会保障政策,因此西方有些学者把19世纪后期到二战前的时期称为英国“社会服务国家”^⑧的建立时期,其特征是国家对社会贫困等问题形成了新的认识,开始对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进行部分的干预。由此可见,英国政府对于社会和经济问题都不再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而是开始适当地加强国家干预的力量。

四

20世纪初英国的关税改革为此后英国经济复苏奠定

了重要的基础。通过这一改革,英国及其自治领殖民地逐渐从一战所带来的经济萧条状态中恢复过来,英国的贸易扩大到帝国各地区以及帝国以外的国家。关税改革措施有利于英国国际贸易条件的改善,促使英国经济从1933年以来出现了比美、法等国更为明显的复苏迹象。30年代,美国和法国的工业产量始终大大低于衰退前的水平,而在英国,1937年的工业产量比1929年高20%以上。这固然与经济危机时英国经济处于低谷有关,但政府进行关税改革以保护国内生产和国外市场,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渥太华会议上通过的帝国特惠制,不仅扩大了英国同帝国各成员国的贸易,也加强了英国在国际市场上同其他帝国主义竞争的實力。“1932至1937年间,英国产品出口到帝国以外国家的出口总值从2亿英镑增加到2.69亿英镑,即增加了35%;而出口到帝国内各个国家的出口总值从1.66亿英镑增加到2.52亿英镑,即增加了52%。”进口的变化也非常显著,“1932至1937年间,来自外国的进口值由4.54亿英镑增加到6.24亿英镑,即增加了27%;来自帝国内的进口值则由2.48亿英镑增加到4.05亿英镑,即增加了64%。”^{②③}可见,关税政策的转变以及帝国特惠政策的实施给英国经济尤其是对外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另一方面,这场关税改革表明英国政府在制订经济发展战略时重心发生了转移,从自由放任原则逐渐向国家干预主义转变,为二战后的全面干预经济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关税改革中使英国政府和民众都逐渐意识到,在变化了的经济形势下自由放任原则存在着重大的不足,而国家对农业、工业和国外贸易等实行保护性政策具有显著的绩效。因此,除了关税领域以外,在其他方面政府也逐渐摒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思想,如废除金本位制度而采用浮动汇率,推动产业合理化运动以加速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过程,以及制订各种社会政策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英国政府在关税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社 会政策等方面所作的调整,使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最终为二战后全面推行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方针打开了巨大的出口。

①① François Crouzet, *The Victorian Econom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4-5, p.54.

② Leone Levi, *The History of British Commerce: and of the Economic Progress of the British nation, 1763-1878*, Boston: 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 2005, p.168.

③ Bernard Semmel,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mperialis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41.

④ 克拉潘、姚曾真译:《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商务印书馆,

1997年,第312页。

⑤ Cheryl Schonhardt-Bailey, *From the Corn Laws to Free Trade: Interests,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6, p.10.

⑥ 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62页。

⑦ 克拉潘、姚曾真译:《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18页。

⑧ 航海法是英国颁布的关于航海贸易的一系列立法,主要内容包 括规定输入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货物必须使用英国或其殖民地的船 只,规定某些产品只能运送到英国或其殖民地等。

⑨ H. Reader Lack (ed.), *The French Treaty and Tariff of 1860*, 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 Petter, and Galpin, 1861, pp.16-17.

⑩ [英]肯尼思·O.摩根 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490页。

⑪ M. W. Kirby, *The Decline of British Economic Power since 1870*,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1, p.1.

⑫ R. K. Webb, *Modern England: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9, p.368.

⑬ Peter 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914*,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370.

⑭ D. H. Aldcroft, *The Entrepreneur and the British Economy 1870-1914*, *Economic Historical Review*, 1964, p.124.

⑮ [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六卷:上册),李 子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97页。

⑯ 参见 Ewen Green (ed.), *The Ideals of Empir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ought, 1903-1913*,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8, p.xix.

⑰⑱ 彼得·马赛厄斯、悉尼·波拉德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王宏伟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47、147页。

⑲ 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ed.), *Trade Regulations & Commercial Policy of the United Kingdom (vol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3, pp.21-22.

⑳ Charles P. Kindleberger, *Historical Economics: Art or Scien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140.

㉑ 参见 James Stuart Olson (eds.),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1, p.298.

㉒ 钱承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页。

㉓ E. H. H. Green, *The Crisis of Conservatism: Th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Ideology of 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Party, 1880-1914*, London: Routledge, 1995, p.2.

㉔ [英]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20-321页。

㉕ Alfred F. Havighurst, *Britain in Transitio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9.

㉖ [英]约·阿·兰·马里欧特:《现代英国:1885-1945》(上卷),姚 曾真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19页。

㉗ David Edgerton, *Warfare State: Britain, 1920-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60.

㉘ 钟璇燕:《约瑟夫·张伯伦与英国关税改革运动(1903-1906年)》,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第44页。

作者简介:欧阳萍,历史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师。湖南湘潭,411201

〔责任编辑:姜守明〕